

首都体育学院督导通讯

2022年第4期（总字第2卷）

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 教务处、研究生部 督导组编

2022年12月31日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教育发展】

■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怀进鹏

■ 以评定向促强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林蕙青 范唯

■ 高等教育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马陆亭

■ 日本高等教育有何“过人之处” 邬大光

■ 学科融合与高等教育创新——以澳门大学的实践为例 宋永华

【名家之言】

■ 教育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 梁启超

■ 我与心理学 张厚粲

【他山之石】

■ 南京大学以“四个聚焦”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 重庆大学凝心聚力、培根铸魂 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 华东师范大学以“四个强化”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教学方法】

■ 教育数字化——赋能还是转型（讲话稿） 陈廷柱

■ VUCA世界与高等教育（讲话稿） 林杉

■ 全球慕课(MOOC)发展趋势研究（讲话稿） 陈肖纯

【教学研究】

■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生素材向优质案例转化研究

■ 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学模式重构与探索

■ 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法学教育的新文科发展之路

【好书推荐】

■ 《数字解读中国》

■ 《做哲学 如何更清晰地思考、写作和争论》

■ 《社会设计 用跨界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引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教育发展】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一个单独部分，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并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全面而系统的部署，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作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重大论断和决策，坚持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优先发展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教育强国建设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表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战略引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对“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进行整体谋划，并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与创新，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共同应对百年变

局，齐心协力战胜前进路上风险困难，充分彰显和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前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期盼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 13 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并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党和国家教育决策的重要遵循，集中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重要理念。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的获得感持续增强。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必将有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教育同人民群众期待更加契合，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

■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坚实基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出台规划，推动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教育普及水平全方位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10 年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这是对新时代我们党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上持续推进取得新成就的高度概括。2021 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4%，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88.1%、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目前，我国教育普及程度总体上稳居全球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社会公认的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9 年，每年全国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输送数以千万计毕业生，继续教育为各行各业培训上亿人次，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拓展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之路。

（二）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尊师重傅、倡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世代传承的文化血脉之中，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持久的磅礴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我国教育现代化越来越焕发出蓬勃生机，教育强国建设更加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创造性地发展了党的教育方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广大师生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党全面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高教育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在发展素质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教师能力素质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推动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进一步提高，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强国做好了充分准备，为全球教育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教育发展实力和服务能力迅速增强。随着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有效落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一批重大教育工程顺利实施，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全覆盖并日益健全，教育系统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尤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实施世界上最大规模在线教学，所有大中小学从停课不停学不停教到复课复学，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全国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级三大科技奖励项目中，高校参与比重和贡献份额均超过60%，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0%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高校积极参与破解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生力军。当前，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宽领域、更加主动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格局正加快形成，我国与188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教育合作交流关系，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0年来，一大批基层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不断涌现，一些长期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教育生态持续向好，引领教风学风持续改善，赢得人民群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更加浓厚。教育系统自身实力的持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必将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发挥出更大优势，也将为今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及其他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支撑、作出更多实质性贡献。

■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总体方向和重点任务

综观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筹谋划，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在于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心向党、奋进拼搏。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党全社会发出新的动员令，对“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作出新的擘画，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未来5年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进行新的部署，着眼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立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大局，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总体方向和重点任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部署新要求，具有统领性、引领性的重要意义。教育系统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完善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锚定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依法保障财政性教育经费拨付使用到位，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教育差距。重点是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更好基础。

（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相互支持配合，共同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协调推进的共同任务。围绕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和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重点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坚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尽快形成与国家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化要求相适应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发展新高地，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四）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教育强国建设激活力、增动力。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继续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重点是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更加重视儿童青少年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办学，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五）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系列部署，教育系统将积极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教育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不断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加强部门地区政策协调，促进学校社会资源共享，形成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奋力谱写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引自《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1日第09版

以评定向促强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林蕙青¹ 范唯²

1. 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2. 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主任

党的二十大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全面布局，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目标任务。教育评估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治理手段。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首次从国家的高度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作出了全局性、战略性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十四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普通高校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审核评估，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是对中央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要求的具体落实。新一轮评估方案是一个认真总结历次评估经验教训，继承、发展和完善的方案；是一个立足新时代，促进、引领教育发展的方案；是一个认真开展前期试点，具有扎实实践基础的方案。

新一轮审核评估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从中央关心、高校关切、社会关注的立德树人、分类办学、教育改革、质量保障4个重大问题入手，破立并举，以评定向，以评促强，助推高校办学定位、育人方式、管理机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认真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必将在全局意义上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以评估推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近年来，高教战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人才培养工作逐渐升温。但从有关机构开展的“高校建立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专题调研看，在深层次上，一些高校“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还存在“软、弱、碎”等问题，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尚未真正确立，教学工作“四个投入不足”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依然较严重。

新一轮审核评估主动对标中央要求，着眼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高校建立“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对评估指标体系的范围、内涵、重心作出重大调整。由原来的“教学评估”转

变为“教育教学评估”，从以往考察教学工作、教学要素转向考察教育教学、育人成效，推动高校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实施路径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强化学校顶层设计、系统设计。新一轮审核评估强调高校党委要加强对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领导，打破以往认为人才培养仅是分管校领导和教务部门负责的惯性思维，引导高校认识到，教育教学工作应是党委领导、校长主抓、院长落实、全员参与的全校性工作，须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来全面夯实人才培养根基、巩固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

二是关注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师教学效果。新一轮审核评估首次探索构建了以1份学校自评报告为主体、3份教学过程性报告和3份就业结果性报告为两翼的“1+3+3”校内外评价体系，从招生、培养、就业等立体多维视角检视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成效。“1+3+3”系列报告的设计，延伸、完善、丰富了评价视角，在以往只注重过程性的“干了什么”基础上，更加强调对结果性的“做成了什么”的关注，充分挖掘教学质量监测数据平台、就业数据平台相关数据，并有效引入了一线教师、在校学生以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等不同利益相关方对学校教学工作、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较为客观地呈现学生学习体验和教师教学效果，避免学校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情况，为评估后整改和教学建设与改革明确了方向、依据。同时，“1+3+3”系列报告翔实的数据，也为高校提供了“既立足教育看教育，又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坚实支撑，切实推动高校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从注重“教得好”转向“学得好”“发展好”，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三是促进学校全员育人机制建立。新一轮审核评估通过设立以“立德树人”为统领的评估指标体系，引导高校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设计以学生为中心、以育人为主线的教育教学制度体系，推动学校凝聚、联动和升级以往校内松散的举措，明确校内全员育人职责，强化责任统筹、力量整合、系统推进，使“三全育人”落地生根。

■以评估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再到普及化教育的两次重大跨越。针对量大面广、复杂多样的高校办学实际，分类发展、相互协调、有序竞争已成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针对高校长期以来同质化办学的突出问题，以及分类发展、特色发展评估导向机制尚未形成的困局，新一轮审核评估首次采取柔性分类方法，为高校提供导向鲜明的“两类四种”评估方案和若干模块化指标。这意味着，不再使用一套指标衡量所有学校，参评学校可以选择评估类型和指标模块，鼓励参评高校根据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学校自身使命任务和发展目标，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和模块组合，形成“一校一方案”，更好地实现分类发展、特色办学。新一轮审核评估推出的“两类四种”分类评估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重大突破，会有力、有效地引导学校形成各安其位、结构合理、特色彰显的高等教育新格局。具体来讲，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适宜可选类型促高校明晰办学定位。从前期试点高校的经验看，高校选择评估类型的过程，就是全校面向未来发展需求对学校办学再思考、再定位的过程，使高校能够更加理性地思考、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目标使命和发展方向。选择第一类评估的高校，定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进一步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和第一类评估指标内涵，通过考察一流师资、一流育人平台，以及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所必备的质量保障能力，激励这些学校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服务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国家战略，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选择第二类评估的高校，办学更加紧密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聚焦到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培养人才，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是以定制组合指标模块引高校实现特色发展。新一轮审核评估通过设置“统一必选项”“类型必选项”“特色可选项”“首评限选项”不同指标模块，由高校进行自主选择组合，定制形成适合本校的评估方案。不同高校可以通过自主选择、组合评估指标模块来进行“自我画像”，用量身定制的尺子量自己，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各展所长、办出特色和水平。从试点高校看，都通过模块指标组合勾勒出了符合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千校一面”。

三是以多种常模数据助高校找准坐标方位。新一轮审核评估分类设置了多种常模数据供高校作对照比较，帮助学校找准与同类高校、目标学校的差距，持续改进提高。试点中我们发现，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第一类参评高校，在分析国内目标学校常模的同时，特别关注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关键性指标常模数据，力求通过国内外比较，找到学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在全球坐标中的方位优势与落差，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参考依据。

■以评估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再深化

改革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看，由于底子薄、历史惯性大、社会环境复杂等原因，部分高校的教育观念、体制机制、培养模式、内容方法等依然相对落后。我们的人才培养与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比，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比，与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进程比，都有较大的差距。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一轮审核评估着力于推动高校增强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力和活力，改变当前一些学校改革疲软、停滞不前的状况，鼓励高校勇涉“深水区”、勇啃“硬骨头”，转变观念、优化体系、创新模式、改革内容方式，开创教育教学改革新局面。

从指标设计和试点高校的情况看，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快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将“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未来发展”切实落实在学校一切教育活动中。第二，推进新型校地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培养模式。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通过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等优势力量构建发展“共同体”，通过共建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与创新型企业、现代企业深度对接，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形成多方参与的实践教学网络，培养学生适应未来、解决实际问题、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第三，改革教学内容体系。特别是打破按传统学科构建的课程体系，突出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导向，突出体现现代科技进展、趋势的知识能力导向，突出强化自主学习和综合创新能力培养导向，整合优化课程体系。第四，抢抓机遇，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数字化教育将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带来全面、深刻的变革。高校要增强紧迫感，积极投身、主动适应，引导广大教师更新观念，积极参与，深入研究数字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教育数字化带动全方位的教育教学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在人才培养上改革创新，努力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各高校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契机，在“十四五”期间以明确的改革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使教学改革向纵深推进。当然，不同高校的办学定位不同、条件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有些学校着力于研究型人才培养，有些学校着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些学校进行系统化改革，有些学校进行局部性改革。无论如何，所有学校都应积极行动，方向一致，因校制宜，分类推进，共同前进。

■以评估推动高校建立现代大学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中突出薄弱的部分。有关调研发现，即便是国内顶尖高校，在质量保障的办学理念、制度体系乃至大学文化等方面，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新一轮审核评估立足于以外促内，通过外部评估，切实加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推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重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评估，进一步明确、强化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责任。在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每一所学校都要将其作为提高质量的重中之重抓住、抓好。二是重视体系化、制度化开展内部质量保障建设，以制度夯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通过建立和完善稳定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四个投入不足”等问题，确保学校资源持续、稳定地向人才培养、本科教育集中和倾斜。三是重视加强对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各方统筹，有效凝聚育人合力。以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为主线，串联、整合、升级各项松散的质量保障举措，构建起全校上下全面参与、权责清晰、衔接顺畅、执行有力的育人运行机制和质量保障机制，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由点到面、由短期“应试”到常态高效的全面持久保障。四是重视“评价—反馈—改进—提升”质量闭环管理和质量文化建设。通过形成闭环管理机制，促进校院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并改进育人服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治理水平；促进教师自觉实践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本领；促进学生更加关注学习成效，增强学习动力，实现教学质量“自查、自纠”循环发展提高的机制，形成“自觉、自省、自律”的质量文化，为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持续提供内生动力。

当前，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全面启动，吹响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集结号和冲锋号。各高校应抓住机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做好评估工作，不是做表面文章，不是做花样文章，更不是做虚假文章，而是一个检验我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才培养中心工作是否到位的过程，一个重新审视学校发展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度、匹配度和贡献度的过程，一个发现短板弱项、教育改革再出发的过程，一个全校师生凝聚共识、汇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过程。

广大高校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作为，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磅礴力量。

引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26日 第05版

高等教育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马陆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2022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高等教育围绕中心工作、聚焦发展主题、服务两个大局，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强调，要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总体阐释了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提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过去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科技大学老教授、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中及在四川、新疆考察时也均对高等教育提出要求和期望。

2022年1月，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高等教育要以创新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由此确定了全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并具体聚焦以人才培养服务人才强国战略、以科研创新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以学科专业结构适应新发展格局、以“双一流”建设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布局等方面深入谋划。2月14日，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布局59个、工程类学科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92个，凸显了加强基础理论和新兴科技领域的战略导向，提出淡化身份，以真正的世界一流支撑国家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模式，突出了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重点方向。8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则对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全面部署。

这是一个创新发展的年代。这一年，面对国际竞争加剧、数字时代来临、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等诸多挑战，高等教育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着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不凡

的成就。此外，过去这一年，高等教育注重以评价改革牵引育人方式和办学模式改革，按照基础研究、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不同规律实施多元评价，推动重大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改革，着手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断探索和完善高校分类发展和分类评价模式。

3000多所高校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近两年每年有超过千万的毕业生走向社会，高校承担着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基础的底色。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需要认真思考以下议题。

在趋势应对上，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数字时代和推动高水平开放。高等教育地位的提升从根本上说是源自对创新的需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催生出崭新的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只有融入世界才能站在科技的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自身认识上，协调好政治理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的统一。教育首先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需要达到“忘我”境界，但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组织功能，又必须做好“本我”特色。高等教育要在遵循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支撑国家建设。

在实践行动上，切实做好育人和办学核心工作。育人和办学是高校的永恒主题，但时代赋予了其新的特征。育人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办学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注重解决国家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

引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28日 第02版

日本高等教育有何“过人之处”

邬大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每年十月份诺贝尔奖获得者揭晓的日子，几乎都可以听到日本学者获奖的消息。作为一位高等教育学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日本学者获得诺贝尔奖？日本高等教育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其中的奥秘何在？在我的好友中，有一位教授被称为“日本通”，他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就聊到了日本高等教育。作为一名长期的“倾听者”，结合自己多次赴日本交流的所见所闻，似乎“悟出”了日本高等教育与获得诺贝尔奖之间的“秘笈”。当我国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整体陷入“诺贝尔奖情结”久久不能自拔时，或许从日本高等教育历史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可以窥视一、二日本高等教育的“过人”之处。

一、日本高等教育的两个现象

长期以来，大学都被视为一个“保守”的组织，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高等教育活动是一个“被动适应”社会的过程，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约；高水平人才培养是一个“细活”，需要长期作为大学最重要的职能；原创的科技成果是一个考验视野和定力的过程，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保持平衡。总之，大学的各种活动尤其是人才培养的成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但从二战之后到世纪之交，人们不断赋予大学“引领”社会的职能，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这一共识逐渐在一些国家见到了效果，日本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大学犹如一个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令世界刮目相看，尤其是吸引了我国学界的目光。

首先看一下近二十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日本的集中涌现。2001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力争在未来五十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在此之前的百年历史中，日本已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6位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然而在2001-2021年间，日本连续增加了19位自然科学奖得主，获奖总人数已达28人，提前完成目标指日可待。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缘来看，本科学历均是本国的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几乎都是在本土获得，七所“旧制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教师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东京大学10位、京

都大学7位、名古屋大学3位，三所大学占比高达70%以上，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几所大学。

通过对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经历的考察，不难发现日本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学群”功不可没，这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现象。1877年，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暨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成立，二十年之后，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建立。20世纪初，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陆续成立，至此，日本最初的“五所帝国大学”已经形成。再加上1931年成立的大阪帝国大学，以及1939年成立的“最后的帝国大学”——名古屋大学，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本土的帝国大学发展到7所。从数量与速度来看，是量少且慢的，七所帝国大学前后历经60多年；但从办学质量来看，是水平很高且见效极快的。直到今天，这些“旧制帝国大学”仍支撑着日本科技界的半壁江山，并占据着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塔尖”。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涌现，让我想起曾经访问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的经历。在参观这些日本一流大学实验室时，我发现这些实验室的条件和空间并不像事先想象的那样先进，其中部分设备看起来很旧，也不知道来自哪个国家。后来我与从日本归来在厦大任职的一位院长聊起此事，才知道在日本大学的实验室，几乎看不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实验设备，基本都是“Made in Japan”。其原因就是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实验设备，只有自己研发设备才能走到科学研究的前沿；研制出来的最新实验设备都是首先在大学实验室使用，当这些设备的潜力被挖掘得差不多了，才向市场公开或向其他国家“推销”。那些看似“陈旧”的设备，几乎都是大学研究人员与企业工程师联合研发的；花钱买来的实验设备看似很“先进”，但对从事原创或高水平的科研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我问起日本大学的“实验室现象”和科技腾飞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涌现的现象是否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及对这些现象该做如何解释时，该院长还告诉我：他认为中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差距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定力，包括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择与推进。在研究领域上，日本十分重视基础研究，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在“长线”与“短线”之间兼顾，短平快的科研无法走向世界前沿。针对科学研究的推进，他打了一个“挖井”的比喻。日本学者在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之后，就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好比“挖井”，不见到水不罢休。而我国学者看到别人挖的井见到了水，往往就会放弃自己挖的井，跑到别人的井里跟着挖，或者到别人的井里舀水喝。当然，也许有人一辈子挖不到水，但总会有人挖到水。在他看来，这就是日本科技崛起的过人之处。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另当别论，但至少揭示了一个现象：做科研需要定力和持恒。正是听了该院长的说法，我不再迷信甚至也不再相信那些有钱的大学依赖全部进口就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那些“卡脖子”领域。当然，基于人才培养的教学实验室例外。

日本大学实验室的所见所闻颠覆了我的认知，从实验室的观感到现在“井喷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涌现，两者之间似乎呈线性关系，这恐怕就是日本高等教育支撑科学技术突破性发展的“过人之处”！诚然，把日本大学的“实验室现象”与“诺贝尔奖现象”联系起来也许过于牵强，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是不可否认的。为了验证日本大学实验室的这些做法是否具有普遍性，我曾多次向从日本归来的学者求证，他们的感受和看法基本一致：在日本大学的实验室，总能看到一些教授一边做科研，一边自己动手研制新设备，当新的研究成果出来时，一批最新的研究设备也就成型了……难道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日本科技力量日益强大的背后“秘笈”？

近二十年是日本科技人才的收获季节，从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现象出发，联想到我国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至少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我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力比之日本还是有较大差距。如果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爆发”是一种“果”，那一定是得益于之前所种下的“因”以及长期的积淀过程，这个“因”应该就是日本的大学了。认识日本大学这个“因”和其累积过程对我们理解日本科技实力的“爆发”和人才辈出现象也许会有些益处，因为人们今天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识往往都是由“果”推“因”。从“因”的角度来看，我国既不缺百年名校，也不缺在各种

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在各种排名榜上的位次和数量都在不断上升，也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

在 2022 年世界四个主要大学排行榜的前 200 强大学中，我国入围的高校数量与日本相比已经远远领先。如在美国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有 14 所，日本有 2 所；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有 16 所，日本有 2 所；在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有 14 所，日本有 8 所；在中国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我国有 30 所，日本有 6 所。不难看出，我国一流大学的数量在“四大”排行榜上已经完全“碾压”了日本。但问题是我们的一流大学并没有培养出合乎其名的一流人才，并没有回答困扰我国多年的“钱学森之问”，是否也可以把这个现象也比喻为“钱学森之问”？殊不知，我国一流大学享有全国最为集中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又集聚了全中国最为优秀的学生与教师，为什么没有取得足以捍卫起自己的以及国家给予的荣誉与地位的成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也许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日本高等教育的演进与转型特征

从历史上看，日本近代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步并无明显的时间差，前后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积累，在形成方式上都属于“后发外生型”，即以模仿西方大学模式为始端。日本于 1872 年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代教育法令——《学制》，标志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起步。该学制吸收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制度，被誉为日本近代高等教育起步的里程碑。1877 年，日本依《学制》建立了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被视为“最早出现的欧美型大学”。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逐渐从吸收欧美各方之长转向学习德国模式。1886 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导下，日本政府颁布《学校令》，使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其中《帝国大学令》主要借鉴了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模式，标志着“帝国大学”开始朝着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新型大学迈进。1918 年，日本大正政府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大学令》，至此，日本近代大学体系基本形成。

近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步于日本之后。受甲午战争影响，最初的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参照日本，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而制定，1906 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亦是以日本为主要参照。民国初年蔡元培主持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仿制德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大学令》。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还效仿欧洲大学推进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1922 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开始由效法日本和德国转向学习美国模式。根据《壬戌学制》和参照美国模式，初步建立了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也成为晚清以来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近代教育学制。历史演进至此，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基本确立。

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到二战结束，中日两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基本相似，走的都是西化之路，都深受欧美大学模式的主导与影响，且都在不断转换与调整着借鉴的对象与范围，但学习的力度和向度有较大差别，尤其是对学习对象的改造，日本显然下足了功夫。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走上了学习前苏联的道路，日本则是继续沿着二战后的美国模式前行，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开始分道扬镳。具体而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政府优先发展并不遗余力的扶植“帝国大学”。这是贯穿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过程性”特征。在近代化初期，明治政府为迅速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打破了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的传统，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优先并重点建立了一些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东京大学就是一个代表。1877 年东京大学初创时期，国内并没有能够教授西方新型科技知识的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明治政府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教师，这就使东京大学从办学伊始就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880 年明治政府给东京大学的拨款占该年全部文教经费的 40.49%，也是一个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的例证，这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独立办学，一方面注重人才引进，另一方面同步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以充实本土师资队伍，大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逐渐取代了外国师资。据统计，东京大学建校之初基本都是外

籍教师，到 1889 年，东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基本由归国留学生替换完成，而这个替换过程前后不过十余年，这也是日本高等教育能够实现本土化改造的一个关键原因。总之，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日本对“帝国大学”的重视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后来延续高等教育的“精英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时期，日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立、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二战前，日本高等教育虽然移植欧洲（主要是德国）大学模式，但发展私立院校的美国模式也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18 年《大学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在制度上健全了国、公、私立高等教育体系，并为二战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强制推动下，按照“一府县一大学”的原则，对旧制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造，全面学习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如今，其大学制度主要由具有不同优势与功能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共同组成，国立大学 86 所，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7 所“旧制帝国大学”纳入了国立大学体系，成为了国立大学的“龙头”。国立大学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注重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特色与优势。从量上来说，私立大学占高校数量与学生数量的四分之三，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发展的主力军。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非常重视私立大学，通过资助政策调控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使得一批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齐名。此外，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日本在学习西方大学模式过程中，政府重视培育大学的“独立教育”能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的高等机构。例如，虽然在日本也出现了教会大学，但办学权一直掌握在本国人手中。在我走访过的几所日本教会大学里，我发现这些教会大学都是日本教会办的，没有西方教会的痕迹。原来从近代伊始，日本政府就明确地表示教会大学的主权不让渡。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日本的教会大学与本土的宗教实现了“结合”，在后期也没有出现类似于我国教会大学办学历史上的断裂现象。这一点与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完全不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把创办学校当作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他们所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教育部门管辖，无需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教会大学在我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外国人享有在中国办学的自主权，这也就为后来的教会大学在我国的“消失”埋下了伏笔。

第三，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定型时期，日本对学习西方对象有明确的选择性和“改造”意识。日本的大学从外表上看是很西化的，如建筑物和大学的各种仪式，尤其是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物——钟楼，等等，但当走进其大学的内部场景并深入考察其制度和文化时，往往感受到的却是浓郁的本土气息，如家长式的师道尊严，“刻板”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文化，乃至大学教授退休时的“退官仪式”，等等。这是因为日本在移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实行“拿来主义”，从不专独于一个国家、一种形式的大学模式，适时调整学习对象并进行本土化改造，非常讲究在本土的实效性。在模式选择后依然保存着本国的文化传统；在学科设置上非常注重根据国家发展之需，如东京大学是日本引进西学的中心，初建时设立法学、理学、文学和医学四个学部，其中法、理、文三个学部取之英美模式，医学部借鉴的是德国模式。1886 年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后，新增工科和农科，形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六大学部。而工科和农科并不出于欧洲大学，是日本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才之急需所设立，这也成为日本综合性大学之独创。再如，国立和公立大学的部门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较类似，私立院校又颇似美国的学院体制。正如有学者所言，日本的“选择性移植”是没有大学理念的，博采众长而又擅长本土化改造，养成了一种“混血儿”的结构。

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大学改革，又给大学足够的自主发展空间。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尤其是对国立和公立大学的“管控”严格且具体，具有较强的“计划性”，这也是日本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了几十年之后，国立和公立大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惰性。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激发国立大学的办学活力和竞争力，政府在 2004 年推出了“国立大学法人化”的重大改革，其思路就

是借鉴“新自由主义”思想，让公办大学直接面对市场，强化其社会服务能力。“国立大学法人化”实施近二十年之后，国办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发生了变化，其效果已经显现。但政府拨给国立大学的运行经费依然在 50%左右，这使得国立大学能够延续其长期实行“优质低价”的学费政策，目的是不让家庭困难的好学生流失。这与美国私立大学的“优质优价”形成了鲜明对比。需要提及的是，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办学历史决定了大学的地位，两者之间高度相关。七所“旧制帝国大学”都是二战后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它们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在许多领域起着“引领”日本高等教育改革方向的作用。2008 年访问东京大学，与时任校长聊起了教养教育（西方称之为通识教育）。尽管在 1991 年日本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并使其“大纲化”，各大学纷纷废除原先设置的教养学部，但东京大学不为所动，恪守“教养教育”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根基，始终保留着教养学部，且是该校最庞大的机构。东京大学之所以让“教养教育”坚持下来，即表明学校有自己的办学定力，这得益于政府的一贯态度，即给国立大学较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第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政府竭力保护“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精英性。日本是世界上第二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直有意识地通过政策或“计划手段”保护国立大学的质量。在政府看来，保护“精英性”就是保护质量，国立大学就是要扮演或担当起“精英”教育的角色，维护高等教育的“精英”水准。因此，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大学层面，政府和大学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始终保持相对清醒的认识。在国家层面，政府不提倡或支持国立大学办分校以及进行大学合并，公办大学规模尽可能不扩张或者慢慢地扩张，这些做法都是维护精英教育的有力举措。在大学层面，国立大学纷纷希望办学规模“做小不做大”，大学的质量水平与数量规模呈反比，信奉只有质量才能证明数量的价值。正是由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精英性”保护得比较好，获得的回报也非常高，“诺贝尔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再如，上个世纪 80 年代，当美国的“巨型大学”的概念引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曾对“巨型大学”的规模定义为在学人数超过 1 万人，他们不希望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日本国立大学的办学规模始终保持在 2 万人左右及以下。显然，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传统大学的“精英性”往往被大众化的思潮不可抗力地稀释，但日本的精英教育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一点对我国有很好的启示。

三、启示与思考

通过历史的梳理，如果从“果”和“因”的角度分析日本近年来科技创新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分为“远因”与“近因”两个部分。所谓“远因”，是指近代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为 150 年来日本高等教育演进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因”则是指二战后在美国模式影响下的日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提升了日本大学的现代化水平。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经济强国、文化强国高度相关，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直接决定了该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人才创新能力。就此而言，日本高等教育留给我们的启示有下几个方面：

其一，保持少数高水平大学的“精英性”是确保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迈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始终保持从“帝国大学”到公立大学再到部分高水平私立大学的精英性，充分发挥一流大学的引领作用，拒绝通过扩大一流大学的规模，牺牲一流大学的质量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型的阶段，如何平衡规模与质量的矛盾，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关键问题。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截止 2022 年，全球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扩展到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和一些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普及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包括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涵盖了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类型的机构存在不同的标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同样会呈现出多元化特质，作为最大限度满足公民需求的普及高等教育机构（如开放大学、社区学院等）会不可避免地降低质量标准。但并不意味着高质量、严要求的标准会消失。尽管马丁·特罗强调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同原则，但他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即当大众高等教育体系发展起来时，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会变得多余；相反，它们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张。在晚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马丁·特罗进一步阐

明了自己的想法，高等教育三阶段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聚合，而不是替代，“必须强调的是，一个系统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或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前一个阶段或几个阶段的形式和模式消失或改变。相反，证据表明，每个阶段都存在于一些机构和其他部分机构，而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以承载更多的学生和下一阶段更广泛、更多样的功能。”所以“普及系统出现时，大众高等教育也没有解散。比起库恩的范式转变，更准确的形象是一系列俄罗斯玩偶，每一个都依偎在一个新的更大的玩偶中。”当前，伴随科学技术更新迭代，思想浪潮风起云涌，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发展精英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领导型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与技能传递，也并不是为了培训学生从事特定的职业，而是实现学生能够引领未来社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

其二，明确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并注重发挥一流大学的“引领作用”是寻求高等教育突破性发展的基本条件。近二十年诺贝尔奖获得数量在日本“旧制帝国大学”的井喷式增长，体现了日本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性成就。但是，伟大的科学成就，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形成了的，而是凝练在持之以恒的坚守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尽管我国和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大致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但是截然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环境导致两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历史差距。回溯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大力发展教育定为基本国策，率先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进行教育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保障财力、物力、人力的稳定投入。“与西欧各国相比，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以立法形式确立仅比英国晚两年，而与德国同年，比法国还早 10 年。”由于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对于其重视程度始终处于其他事项的领先地位。例如，当时担任专门学务局局长的滨尾新也说，“在日本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高度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发挥大学的引领价值，实现与社会变革的良性循环，是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反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是在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基础之上的结果，主要以技术的引进为重点，而隐藏在器物文明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文化学习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只是把大学当成救国的工具，随着各种思潮起伏不定，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大学本身发展的角度，审视大学的“基础作用”。丁魁良在总结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说，“日本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下起幼稚园，上迄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则不然，安于旧制，从来不想加以大规模的改革或补充。”日本在学习西方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将大学提升到了西方富强发达源头的高度，进行全方位的借鉴，而不是作为某一种工具来进行学习和效仿。所以“有人称甲午之战是日本的教师在兵士的制服之后为国家取得了胜利”。甲午一战后，日本利用赔款支持国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而我国面对的是各国列强的宰割和军阀混战的割据，侵华战争更是日本对中国大肆的资源掠夺和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彻底破坏。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旧账”，也是造成今日两国高等教育差距的客观因素。知耻而后勇。应该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作用”，尤其对于精英高等教育系统更是责无旁贷，必须要在“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支撑突破性创新；主动适应国内需求，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回应学科交叉与融合，符合学科自身诉求”等方面，处于智源创造的顶端和前沿。

其三，重视并始终以高等教育的“本土转型”为学习目的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崛起的必由之路。日本高等教育成功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从建立伊始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尤其是有意识地对“舶来”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减少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这种意识从一开始就已埋藏在近代大学的建设中，促使日本大学在不断地移植与学习中完成了从作为“西方的大学”到作为“日本的大学”的本土化转型。具体来说，就是日本基本解决了“移植来的大学”向“本土化大学”的转型。由此看来，这是后发国家缩短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发展本土高等教育的一条成功之路。回看近代中国大学发展史，我们并不缺乏“扎根本土”的尝试与经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后兴起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大学国立化运动”、“教科书中国化运动”以及“中国科学化运

动”等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所倡导的“中国化”、“科学化”伴随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背景下被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多方面来看，抗日战争并没有阻断中国大学的历史演进，反而成为推动中国大学本土化实践的一个重要时期。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后，去大学里帮助各学校安排西迁事宜时，曾说“进了大学就像到了外国一样，因为大学在教学时，无论教学教材还是教学方法绝大部分都是采用西方的模式。”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伴随着大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跟随高校迁到我国内陆，这种情况才得以慢慢改变。在内地，大学知识分子无论做科学研究还是教学都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开展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研究此段历史后指出，“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最终遍布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使更多的热能够进大学，也使大学更贴近自己的本土根基”。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中去了大西南和大西北，也去了陕甘宁边区和福建等，考察了当时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现状和水平。他曾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与反思：如果说在此之前的20年，去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想的还只是问什么地方的机器价格最便宜以方便购买，与日本学生专注于机器如何制造截然不同，那么，在这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隔绝中，中国人开始动手制造了。根据李约瑟的观察，在抗战时期中国大学里的科学与技术的各个学科开始扎根本土实际地进行探索了。但是，中国大学的本土化转型发展，时至今日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也可能是由于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过于复杂和战争造成的。

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目标。本土化本质上所探讨的就是一个如何扎根本土办大学的问题。本土化的过程是重新认识自我文明优越性的过程，也是自觉纳入世界文明的过程，人类文明是异质的，进行自身问题和经验的知识生产，是真正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基础。在历史上，“舶来”的西方大学要转变为中国的大学，需要本土化转型；在新时代，中国的大学要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更需要本土化转型。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还未取得日本式的突出成绩，但也一直走在努力探索与寻求突破的转型过程中，试图解决“在中国的大学”向“中国大学”转型这个问题。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开放与封闭并存，特殊的国际形式与时代背景使中国科技与教育的“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没有炮火的战争中”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其紧迫性、难度及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皆已不可同日而语。回答这一问题既需要回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寻找答案，也要从他国经验中借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契合现实，实现高等教育助力科技之发展、服务国家之需要的时代使命。

历史之镜与他国经验往往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被眼前一叶之美好所隐藏掉的真实与完整。对于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简单剖析，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到：21世纪以来的日本科技腾飞并非是一个偶然事件，将其作为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之果”来审视，就会有更为深刻的感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高等教育之崛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一朝兴起的，所有非同寻常的光辉与奇迹背后，都是历史的累积。日本科技腾飞和人才辈出的背后就是百年来的高等教育本土化转型为其奠基。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与借鉴的。

引自《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5期

【名家之言】

梁启超：教育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

梁启超先生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他提到的当时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现在看来依旧是教育难点；他同时认为，教育是最能够引起兴趣的职业之一，如果能够领略到教育的趣味，教师也就不会倦怠了。

■ 启超先生谈教育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

一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

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

■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

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

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

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

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

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

引自：人民教育，本文是梁启超于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作的演讲，有删减。

我与心理学

张厚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走进心理学

我是在初三即将毕业时想要学心理学的，并且一学就是几十年。当时那个年代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都讲科学救国。尽管道路坎坷，我还觉得，我就是要学这门学科！读书的时候我是个比较淘气的学生。我在京城最好的学校念书（贝满女中，现在的一六六中学），但我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对当时老师的教学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不了解我，自然也教不好我。所以，我就想寻找一门能探索人心的学问。记得高中毕业时，同学们填报的志愿大多是化学、物理，当老师问我是初三即将毕业时想要学心理学的，并且一学就是几十年。当时那个年代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都讲科学救国。尽管道路坎坷，我还觉得，我就是要学这门学科！

读书的时候我是个比较淘气的学生。我在京城最好的学校念书（贝满女中，现在的一六六中学），但我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对当时老师的教学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不了解我，自然也教不好我。所以，我就想寻找一门能探索人心的学问。记得高中毕业时，同学们填报的志愿大多是化学、物理，当老师问到我说，我坚定地说：心理学。老师们都很惊奇且有一些遗憾，他们觉得我应该上数学系，可我就偏偏喜爱心理学。

进入大学后我才真正开始学习这门学科。尽管我国古代有很多心理学思想，但科学心理学却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时，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回来以后有几个学心理学

的，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先生，他师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冯特是实验心理学之父，心理学的鼻祖，他的中国学生就是蔡元培。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另外一位教授陈大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那时起（二三十年代），小学到大学，做了很多测验，最早的测验是由美国人做的。那是1915年，他们测到底是美国儿童智力高还是中国儿童智力高。中国500个孩子参加了测试，结果是中国的孩子智力高，他们不敢往外宣传。但是，现在要仔细分析，我们是在哪些方面强？我们发现，中国儿童在小时候是不错的，但到了大学以后，需要创造力，咱们就差了。中国儿童的创造方面比较差，基础知识比较好，这我们现在都承认。通过我举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心理学还是比较兴盛的时期。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之路。

二、历经战乱，沉浮中坚持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外国人都走了，我们都迁到西南联大，整个学术也因战乱衰落下来，心理学更是如此，它毕竟在当时是小学科、冷学科，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挺过来了。1948年我在辅仁心理学系毕业时，我们班就三个人，不过人少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你怎么考都是前三名。但当时我是第一。后来我因为成绩好留校任教，我们的系主任是德国的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本就起源于德国，而他就是冯特的徒孙这一代。所以说，我们学的是正统心理学，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抗日战争时，心理学就停滞了，但解放后，心理学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强调政治，政治跟学术没有分清。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学唯物主义，认为心理学是唯心的，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一直被打压着。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把心理系给取消了，几个学生都并入了教育系。另外，此时不光批判心理学是唯心学科，更给它扣上了“反动”的帽子，还把辅仁大学来的老师和学生都打成了反动派。

我出身不好（因我是张之洞的孙女），是官宦家庭，从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学反动的心理学，当时的境况十分不好。但我还在坚持，因为我相信这个学科虽然现在遇到一点困难，但我很坚定地认为只要把这个学科学好，对教育和教学都好！我就这一个想法，所以就坚持下来了，我什么都不争，只是为了事业。

1958年第一次挨批判，从北师大开始，叫拔白旗。我才30多一点，现在看来30岁不算什么，可能才是研究生。可那时我已经是教了很多年书的老师了。因我21岁就开始教书，是年轻的“老”老师了，所以我是个大白旗。那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版拔白旗，我就是那大白旗。此外，《光明日报》还出了两本批判集，原来图书馆还有，后来被收起来不让看了，因为确实不合理。大家对我的批判里，有一条说我讲课好。因为你讲课放毒，你讲课最好，所以你在毒害学生，毒害最深。可能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能理解我的这段经历，连我自己都想不通。

心理学在“文革”时就更糟了，由姚文元开始，把心理学打成了伪科学。那时候批判是不能上前辩驳的，说你是假的、伪科学，就已经给你定性了。这时，很多人都说心理学死了，教心理学的老师命运也凄惨，有老师自杀了，有些年轻老师转行了，因为心理学系整天出麻烦。而且当时老师多半都下乡了，我因为家里有个小女儿没人照料，所以没让我上干校，不过我也在生物系的农场里干了一年，冬天在图书馆里搬白菜，搬了一冬天的白菜，又在物理系的小工厂做了两年下线工。

直到1960年，局势才有所缓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门学科，觉得心理学也还行，能解决很多实际遇到的问题。北师大做了一件影响了全国的心理学界的大事——成立了心理学专业。1960年时我们还完全归教育系，只开设了一门普通心理学，后来才有儿童心理学，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心理学出身。领导开课时间问我应该上什么课，我说上实验心理学。“好，你上！”我说得上统计心理学。“好，你上！”结果和领导协商后，每门课都我上，可我也不能直接上，毕竟年头过了，我也需要准备、学习，所以那时候我是一边学、一边教，四个年级的课都是我上。也就是那些年艰苦的岁月，从1960年到1965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像林崇德、郑日昌、程正方等等。

心理学得以恢复，我真的很带劲，什么都顾不上了。那时小女儿刚出生，学院产假是56天，之后我就把她送托儿所，自己马上去工作，那么多的课需要我上，我根本顾不了别的事。即使系里就我一个人，我也高兴，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尽我的努力来培养一批好学生，振兴心理学

科。之后到了“文革”，大家知道“文革”时不能看外文书，不能读英语。心理学又没有了，没有书，也没有笔记，我就凭脑袋了！那段时间也是异常的艰难，生活的苦都可以忍受，唯独专业发展的瓶颈，让我从心底觉得难受。

北师大的心理学系发展很坎坷，但我总是在里头，还是很重要一员。每次遇到批判，总是先批我，因为我出身不好，而且就一个人还在坚持着这门学科，所以错都是我的。我也没什么可以辩护，我根本不在乎那些，我就是从心里爱心理学，跟它共患难，有了感情。

1978年以后，直到1985年，全国只有五个心理系：北师大、北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和华南师大。再看这些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三十年里，心理学的发展可谓蓬勃向上，现在在200多所学校都开设心理学的课，可能还不止。心理学从那个被打倒的伪科学，真正站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学科。应该这样说，有如今的成绩是非常不易的，幸运的是在这其中一直有我！前面一段艰难的时候我参加，后面好起来的一段我也参加了。我跟心理学那是纠缠不清的。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身体好，基因好，小时候运动好，营养也不错，教育也好，这都是我好的地方，还有我心态最好了，我就这样子一直挺过来了。

三、学科恢复，曲折中求发展

谈到心理学的恢复，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在杭州大学，由陈立老先生主持，办了一个全国各校心理学老师来学习实验心理学的班，培训实验心理学。讲课的老师有北大的，北师大的，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总讲认知过程。我讲课很受欢迎。科学院的人不大会讲课，闷头只讲实验，与学生没有互动。我就不一样了，我最初学心理学就是想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得更快更好，所以，我上课很注意学生的反应。那一拨学生后来都从事了实验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博导了。这些学生里面还有年龄比我大的。这是我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班，对心理学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二，1979年在全国心理学大会上，大家都意气风发，觉得很高兴。而我这人就爱多事儿，我想，心理测验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小分支。（心理学）都恢复了，为什么这一支不恢复呢？因为这一支是在“文革”挨批挨得最厉害的，当时只强调人的阶级差异，不能说人有其他差异。“文革”的时候，测验在最底层，被批判得最厉害。现在是不是能够让它“重见天日”了！我就跟湖北大学的一个老师说：“你跟我合作，我们起草一个文件。”于是，我们俩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心理学恢复了，心理测验作为它的一个分支也应该恢复。在那次大会上，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承认我们是对的。但是怎么做？谁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有一部分人还心有余悸，虽然我说的大家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人做。那怎么办？我说还是我来吧！

我就去找我的老师——林传鼎，我的测验课都是林老师教的。我跟林老师商议，林老师说：“行，你来安排，我来上课。”再加上北大的吴天敏老师，我们三人于1980年5月在武汉办了一个测验班。我就敢那么干。全国老师大概来30个人吧。林先生讲智力测验，吴先生讲比纳测验，我教统计。解放以后，教育系都是文科的，所以谁也不会统计，可是你要真学测验，不会不行，所以我就想啃这块“硬骨头”，第一本心理学的统计书就是我写的！坦白地说，我上这门课很不容易，那时只讲到很简单的描述统计，后来统计学本身发展了，我也得学，再把心理学的知识加上。我讲统计，另外两位老师讲测验，我们这班运行得挺好。那拨学员也是后来全国心理测验的主要人物。

这两个班把我国的心理学抬起来了，这些老师是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一回去就起作用了。我在这其中也做了点好事，帮助心理学建立起来。并且在那个班里林先生讲完测验，国外的韦氏测验也引进中国，我们又组织全国学习了韦氏测验，中国的第一个测验就开始了。

从1980年后，心理学真正恢复，一直到现在，各地都发展起来了。

四、教改之机，润物细无声

众所周知，高考刚恢复（1978）时，一切百废待兴，连考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那时考大学是事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考上就能有好的前途等着你，考不上只能回农村。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我在上78级本科生的统计课时，需要分析高考的数据，可当时国家是保守的。

后来，教育部认识到国家的教育改革要来了，于是把美国的ETS请到了中国，把各省高招办的主任和负责人都请来听ETS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报告会。当时因为我做统计，所以也给了我6个名额让我去听报告。但因课程多，我没去，就安排了几个学生去，学生听完回来跟我汇报说讲得还可以，但底下很多人听不懂，学生们把他们不懂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交了上去，可在会场并未得到答复。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心理系领导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跟外国人联系，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原来那些外国人看完我的学生提问的纸条后就过来找我们，想要跟我们座谈。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外国专家看见这有几个明白人，还能够交流，有了像样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进一步跟我们沟通，我觉得是件不错的事，就把学生召集起来，让他们认真准备。当时我们有两个英语特别好的学生，我让他们准备一个欢迎辞和一些主要问题，另外一些学生各自也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等到外国专家来时，他们坐一排，我们坐一排，高教司司长就坐在我对面，而且还指定了一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做翻译。外国专家讲完了我就让学生讲，提问题请人家回答。他们的回答学生们都能听懂，我也不插言，当遇到我认为比较晦涩的问题，我就补充几句，就这样，我们很友好顺利地谈完了。

之后，高教司的司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几个学生。我回答说还不行，他们连三年级都还没念完。另外，那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因为不太清楚一些专业词汇，其实翻译得是不够准确的，可我们的学生都表现得特别好。那次我们非常成功，给北师大争了光，也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之后我们就跟教育部、教委联系上了，索要了高考数据，我们需要做分析、做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改革。我们提出增加题型，选择题、判断题都是我们提出来的。后来，我们又干了几年，因为改得好，还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是从高教司分出一些人成立的。我们和高教司合作得很好，那时官员很虚心好学，我们也尊重他们，相互配合很好，所以，因为高考改革这件事情，我们还得了教育研究的一等奖。

再后来，我们终于从教育系分出来了，心理学系正式成为独立的系科。国家提出来，教育要适应科学，科学要走向应用，心理学也跟着走向应用了。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其他资格考试，都看到了心理学的用处，渐渐地，心理学就走向了应用，我们这里现在也变成应用心理系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师大的心理学就是应用，因为我的想法是心理学走向社会，社会各个方面要认可心理学。原来毕竟学生想来学，家长还有防备在里面，但是现在家长也都支持学生学心理学了。现在心理学在社会各界广泛得到应用，包括教育学，也不能忽视心理学，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另一方面，我想讲的是心理学的对外交往。心理学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成功，跟国际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国家说要赶上国际水平，甚至超越国际水平，而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1978年、1980年，科学院派出一个团，共4个人前往德国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会上，申请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大有发展，外国人也认可了。1984年，我国开始正式作为一个会员国，每次大会都需要派出2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出国是很不容易的，自1979年起我就有三个机会，但都因我出身不好，得不到学校的信任，都被否定了。到1981年我向学校力争，并保证返回，学校才让我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大家知道我的确不会跑出去，之后就不太限制我出国了。1984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心理学大会执委会，并被选入了执委。全世界现在有七八十个国家都是会员国家。我们从1984年进去当执委，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始终在执委会里没出来。中科院心理所的荆其诚老师，当了八年执委，到1992年当选国际心联的副主席，1996年他才卸任。我一直是代表，1996年进入执委，到2000年，我又当选为副主席。之后，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张侃接任我。中国从1984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们都在执委会里，并且中国有三个国际副主席。

当然，我们能够连续做执委，跟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地位提高，他们不敢小看中国，这个很重要，这是一条；别的学科没有，只有心理学这样，那就跟心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地位真的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给我们做后盾，我们也争气。

心理学从过去，从伪科学到现在的面貌，几十年打造取得这样的成果真的是很不易。尽管我一直在被限制，但是我觉得也还挺高兴的，我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死，而且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说

历史，讲故事。我很高兴，因为心理学的发展我比谁都清楚，所有的活动我都参与了。在这其中有苦难，抛开个人的得失，心理学的成功有我一份，我觉得无比骄傲！今天，我跟大家讲心理学，是因为我跟心理学经过了这么一条坎坷的道路，但是现在都过去了，说句玩笑话，中国的心理学比我发展得更好！

五、做敢于表达、勇于争取的中国新世纪妇女

我觉得妇女做出来的成绩，更不容易。不仅是说我们的生命条件、身体条件，在家里管的事儿多，而且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有点儿受压。我在心协的时候，当了两次副理事长，始终没能当理事长。因为我是女人，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男性更合适。但不是人家说我们不行，我们就真的不行，我们需要争取。

我再告诉大家一件得意事，作为妇女，我是1983年的三八红旗手，又是妇女委员会主任。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在这个会议之前，1993年的一次大会上，就说世妇会要在中国开，这表明我们中国的妇女运动搞得好，妇女地位在提高。黄启藻，那时的妇联主席，他讲得都挺好，但却说世界妇女大会的主席是李铁映。我当时就发言了，为什么妇女大会要一男的当主席？咱们这么多人，说妇女解放了半天，怎么就出不来个主席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主席改成了彭佩云。那天开幕式，我看到彭佩云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站在那儿讲话，我觉得很神气，代表中国妇女有这个地位。中国妇女站起来了，全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妇女得说话，妇女得争取。现在，女同学的成绩都好，从小就是女生老实，女生分儿高，所以重点学校都是女生，三好学生也是女生，研究生也是女生越来越多。再者，女的再棒，都是“员”，领班员、服务员，什么这个“员”，那个“员”，而男的都是“长”，科长、部长、处长……现实是不是这样呢？

如今国外有多少女总统出来了，中国还早着。尽管现在不管人大，还是政协，都会提到女性的比例高了多少，但如果拿人口数来讲，还差得很远。这里有妇女自己努力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个改变人们传统旧思想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女人要自信、自强，别老觉着自己不行。我也不信女的各方面都应该跟男的比。女飞行员、女伞兵、女武警，我觉得这些职业里的女性少一点也没关系，别老把女人都干成“那样”。我们要自立自强，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长处。平等就是各有长短，才能够做到和谐。所以，女人要打扮得好一点儿，漂亮一点儿很重要，女同学们别怕麻烦，我们只要自己站得稳、站得正，自重，有自信！

像心理学，那么惨的一个学科，我们都做起来了，你们别的学科，一定比我们心理学科会做得更好。我就是个不文不理，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人，这么一个马马虎虎、经历不怎么顺当的人来给同学们做个报告。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我始终不是很幸运，但是我始终都是很乐观的样子。我在工作，而我觉得心理学现在能够成功，我很开心，因为这里有我一份力量！2012年全国教育科学给予我突出贡献奖。

【他山之石】

南京大学以“四个聚焦”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南京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注重统筹规划、完善选拔机制、优化培养模式、强化师资建设，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作出更大贡献。

聚焦融合发展，加强统筹规划。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领导小组，实施“基础学科拔尖计划2.0”，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的意见》，统筹校内优质资源，完善运行保障体系，积极稳步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工作。注重学科融合，推进“大理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在各个基地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汇聚学科创新资源，

探索物理学与化学、生物科学、材料学、计算科学、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等学科交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设立“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大地学实验班等，集聚地质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等“拔尖计划”学生，着力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地学人才。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将“五育并举”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环节，构建“三全育人”新生态，促进拔尖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全面发展。

聚焦创新潜质，完善选拔机制。实施基础学科“零年级计划”，搭建校内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与国内中学的合作沟通平台，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不断强化协同育人。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吸引具有创新潜质的中学生走进大学，近距离感受学科魅力、感知大师风采、培养学术志趣。持续完善拔尖学生选拔机制，探索开展新生入校“二次选拔”，科学制定选拔方案和标准，不断优化选拔流程和环节，提供多渠道的专业咨询服务，帮助新生深入系统了解各个学科，遴选对基础学科有志向、有志愿的优秀学生。各培养基地根据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综合考察、多元评价、择优录取。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实施“申请—考核”制，健全学习成果多元考评体系，开展长周期、过程性、科学性评价，基地内每学年实施“柔性”考核，注重学生创新性和发展潜力，着力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研究。

聚焦内涵建设，优化培养模式。以应对未来发展变革为目标，不断丰富完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掌握适应时代发展的素质能力。注重“通专融合”，以“悦读经典计划”“科学之光”等课程为依托，开设具有校本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拓展多学科知识基础和实践能力。开设学科前沿课程，突出创新性和挑战度，激励学生以创新之志勇攀科研高峰。注重科教融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学科特色，开设“项目制”课程，促进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有机结合。开放校内各类研究基地资源，为学生开展科研训练提供有力支持，推动科学研究与学生创新思维训练、创新能力培养深度融合。通过开展境外访学、国际科考、短期交流、学术会议等，帮助学生开拓学术视野，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注重本研融合，探索实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贯通式培养模式，推动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培养学制贯通、培养路径衔接，大力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攻读基础学科研究生，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

聚焦成长引领，建强师资队伍。建立突出学科文化和价值理念的特色书院，由知名学者担任首席教授，广泛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担任导师，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营造浓厚的科学研究氛围。如，哲学拔尖基地成立“爱智书院”，打造“浸润、熏陶、养成、感染、培育”的师生共同体文化；生物科学拔尖基地成立“秉志书院”，传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崇高精神，激发学生科研报国土志。在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设立责任教授岗位，为课程体系规划、教学模式改革、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等提供指导和咨询。建立涵盖“学业—学术—生涯”的导师指导体系，为每名拔尖学生配备多位导师，帮助学生明确发展方向，给予学生全流程、全方位指导帮助。积极发挥留学归国学者作用，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引导激励学生坚定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引自 教育部简报〔2022〕第62期 2022年12月16日

重庆大学凝心聚力、培根铸魂 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重庆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体系化、科学化、特色化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完善工作机制，唱响立德树人“主旋律”。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校课程思政建设。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定期研究相关工作，经常性组织召开课程思政专题推进会、“三全育人”工作例会等，着力构建党政齐抓共管、本科生院牵头、相关部门联动、院系落实推进、教师全员参与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格局。把课程育人作为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重点，分类梳理教学、科研、实验技术等七类岗位育人职责，纵深打造

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场馆等六大育人阵地。先后制定《课程育人体系建设方案》《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办法》《课程思政教学指导手册》等，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任务和要求，不断优化实施机制，努力确保建设成效。探索建立科学多元的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将教学设计、挖掘转化等测评指标纳入评课评教体系；在年度工作考核、绩效工资核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中，明确将课程思政作为专任教师的重要岗位职责进行重点考核与评价，推动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坚持分类推进，抓牢课程建设“主战场”。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实施专题课程建设项目102项，评选优秀案例37个。探索优化课程思政建设内容、途径及有效载体，系统梳理各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纳入教学大纲和教案，作为课程讲授重点内容和学生考核关键知识，汇编《重庆大学课程育人元素拾萃》，营造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的浓厚氛围。针对公共基础课程，实施专家领衔制，组建名师教学团队，鼓励跨校联合授课；结合地域特色，建设《红岩精神》《大国工匠》等特色课程；开设《文明经典》课程，引导学生在世界文明宏观视野中把握世界大势，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逻辑。针对专业教育课程，融入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家精神、人文精神、职业素养等元素，整理编撰《课程思政教案集萃》，认定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42个，获批市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46项，《数理统计》《土建概论与研讨》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4位教师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针对实践类课程，注重知行合一，深入推进实践教学改革，1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推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以“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和创新创业树声行动、志愿服务启邦行动、社会实践熔炉行动、深造就业扬帆行动“四大实践行动”为载体，大力拓展实践育人平台，引导大学生在实践“大熔炉”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深化改革创新，夯实课堂教学“主渠道”。实施教育教学创新计划，修订《本科课程建设规范》《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将课程思政要求贯穿课堂授课、教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等各环节。积极开发教学资源，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共建共享2000余个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开通“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数据库”，为教师提供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库、名师视频课程库等教学资源，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获批市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重视加强教材建设，做到科学编排、有机融入，切实增强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材的准确性、系统性。强化课程思政理论研究，设立“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完善“培训、立项、评选”工作机制，已立项课题39项，参与教师400余人。广泛开展跨学院、跨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和教学研讨活动，探索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合力育人机制，如，马克思主义学院会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把科研报国、学术道德等融入课堂教学，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加强对课程思政教学情况的专项检查和指导，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协同育人。

注重能力提升，建强教师队伍“主力军”。发挥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作用，针对不同课程类型及特点，开展面向学校全部课程、全体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培训，组织“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坊”等研修活动。鼓励和支持学院基于“课程+专业”开展“一般+特殊”的课程思政能力培训，面向重庆市高校开设课程思政研修班，已培训学员300余人。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岗前培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打造“立德树人”专题展览馆及网上展馆，以珍贵口述史料、教案、工作笔记等实物资料为生动教材，集中展示历代重大人献身教育事业、潜心治学治教的优良传统，编印出版《大学，大师之谓也——重庆大学教授概览》，发挥榜样先进事迹的教育示范作用。加大政策引导激励，评选表彰课程思政优秀案例、优秀教案等，健全教师教学荣誉体系。在教学比赛评审体系中设置课程思政相关指标，鼓励支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努力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统一起来，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以“四个强化”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决策部署，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从组织领导、课程建设、实践育人、以赛促创等方面协同用力，不断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

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完善创新创业支持保障。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校“十四五”规划、“双一流”建设方案，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完善“课程—实践—竞赛—平台”全过程管理服务。支持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打造涵盖教育、智能、文创、健康等特色主题的“创客空间”，累计建设41个创新创业实验室，孵化培育60余个创业项目。开发基于科学测评的学生成长与项目发展全过程跟踪信息系统，将“能力测评—教学模块—竞赛培育—项目管理—资源对接”等融入平台建设，全方位评测学生素质能力，助力创新创业项目实施。构建“学校—学部—院系”支持“双创”的教师绩效激励和学生奖励体系，推动学部、院系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双创”育人模式。设立3300余万元的“大学生科创基金”和“创智汇”创业基金，建设“五创融合”大楼以及科技园创业基地等“双创”场地7000余平方米，吸引126家学生创业企业入驻，积极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支持。

强化课程建设，持续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立项建设47门创新创业课程，推动构建“通识课程+特色课程+专创融合+拓展课程”进阶式“双创”课程体系。重点建设《创新思维训练》《创新创业竞赛与实践》等7门通识课程，实现本科生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培养全覆盖。建设具有师范类院校特色的《教师教育与创新创业》《创业者人格教育》等课程，着力培养学生敢闯会创的本领能力。持续加强《高端软件创新创业》《生命科学领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践》等专创融合课程建设，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强化《创业沙盘模拟》《创新创业实战》等拓展性课程建设，推动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衔接。注重教学模式创新，建立“企业家+教师”共同授课、“校内课堂+校外实践”联动推进、“线上学习+线下学习”有机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探索团队合作、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授课方式。加强教材建设，组织编写《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与实践》《创业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创意、创新与创业》《创新思维训练》《创新创业与教师教育》等“双创”教材，建设60余个教学资源案例集。其中，“五个一百相互支撑，培养未来教育引领者的实践育人模式”获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多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上海市重点课程。

强化实践育人，持续建好创新创业实训平台。深入实施国家级、市级、校级三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按照“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完善校院两级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创新创业训练全覆盖。每年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周，通过创新创业成果展、本科生创新创业学术论坛、研究生科研创新学术论坛、参赛经验总结交流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交流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打造“时代极客、师大创造”校园主题日、“创意集市”学生科创作品展、“大咖教你做科创”慕课等科创品牌项目，为师生搭建展示各领域前沿理论和最新技术成果的交流平台。加强与地方政府深度合作，建设“双创”基地8个，开展教育振兴等公益创业项目1200余个。牵头成立师范类高校“双创”联盟，构建“大学—社区—中小学”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开展大中小學生“红色筑梦”系列“双创”实践活动，累计参与学校100余所。近10年来，支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400余个、市级项目1600余个、校级项目3500余个，“文创师大，大师创文——以‘能力素质提升’为中心的文科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入选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强化以赛促创，持续推动“双创”成果转化应用。推动赛创融合，以学科竞赛促进学生科创团队建设，构建“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三级学科竞赛支持体系，分类梳理重点类赛事72项、一般类赛事78项，每年发布重要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清单，支持引导更多学生参与高水平竞赛和课

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连续 30 年举办“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连续 8 年举办校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承办“第 31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比赛等重大赛事，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共获全国金奖 8 项、银奖 7 项、铜奖 11 项。加强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聘任校内外导师 106 位，进一步强化对重点项目的跟踪、训练、辅导、培育，助力学生“双创”项目顺利实施。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地合作，打造“环华东师大智能教育产业带”和“生命健康产业园”，推进“教育+”“智能+”“生态+”“健康+”“国际+”五项行动计划，孵化培育一批智能教育、精密制造、生命医药、环境生态等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 3000 个。

引自 教育部简报〔2022〕第 46 期 2022 年 11 月 24 日

【教学方法】

教育数字化——赋能还是转型（讲话稿）

陈廷柱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一、缘起：为何关注教育数字化

教育数字化与会议主题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数字化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风险激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愈发紧迫。数字技术去边界、去中心等优势赋能教育发挥更大作用。教育通过技术强化人类共存意识和共同体思维，引领价值观念转型，利于形成“数字命运共同体”，可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扩散。

第二，教育数字化关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技术指向未来，教育现代化须臾离不开技术的加持。对于高等教育，数字技术至少有三大优势：一是有效推动教育资源普惠性和共享性，破解资源配置失衡，促进教育公正。二是重塑教学模式，优化学习过程，促动供给侧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三是以数字技术优势建设兼具智能性、开放性等特征的教育生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质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个性化等需求。

二、疑问：赋能还是转型

伴随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与治理方式等的数字化转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人类愈发走向“数字化生存”新境界。数字技术亦被认为具有重构教育系统与生态的力量，教育领域以“化”称谓某种趋势的现象比较普遍，如终身化、学习化、国际化、普及化等，但类似“教育数字化”之后还冠以“转型”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这关系到教育数字化的根本性与方向性问题，有必要审慎对待。

我们认为，无论是教育信息化，还是教育数字化与智能化，必须以赋能教育为基本指向与旨归，目标在于让更优质、更公平、更便利、更多元的教育惠及更多的受众。教育数字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化”到“转型”这一步，不能纵容技术至上主义者过度夸大技术的作用，更不能联合社会资本鼓吹技术神话，为了转型而转型，人为制造教育焦虑与幻象。

三、澄清：转型指向的教育数字化误区

第一，扭曲数字化目标：聚焦于转型，脱离了教育。技术自身的优势以及数字中国、教育强国等战略部署强化了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从当前实践来看，“重转型，轻教育”、“重设备，轻学生”及“为转型而转型”等现象并不罕见。它将承载丰富内涵的教育教学简化为工具主导的信息传递活动，一味推崇技术的先进性，忽略教育教学规律，难免陷入技术主义陷阱，背离教育改革初衷，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夸大数字化作用：制造数字神话，轻视教育规律。教育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系统功能结构、价值观念等的转变。从实践情况看，将传统教学包装成“智慧教学”，即便应用了

智能设备，但填鸭式教学现象并不少见。虚拟教育、智慧教育等可作为有益补充，但不能替代现实教育。教育数字化不是要脱离传统，是要将技术与教育、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等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教育更好发展。

第三，淡化数字化阻力：忽视现实基础，遮蔽技术缺陷。长久以来，人们对传统教育教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具身性是其应有之义，其最大优势也在于此。同时，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技术的优势取决于使用方式，否则将向消极面转化。其次，不能以优势掩盖其缺陷，认识并妥善处理其缺陷是有效应用技术前提。此外，技术具有破坏性，它需要技术作用对象的适应及规则规范，否则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至灾难性后果。

第四，放纵数字化权力：鼓动“技术暴力”，宰制“数字难民”。数字化是重塑个体认知与生活方式的治理术。伴随技术的自主性愈发强大，不仅可以剥夺人的权力，还将弱势群体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产生新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也存在“信息茧房效应”，表现为学习内容、思维路径等的固化，或对除此之外事物的排斥，造成与他者的疏离和自我封闭，成为“数字难民”。

四、推进：赋能指向的教育数字化路径

综上，我们主张赋能指向的教育数字化，即把数字化作为扩充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途径或手段。具体而言，可从三个视角来谋划推进路径。

其一，要素视角。当前，尽管数字理念深入人心，但区域、学校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等存在明显差距。它实际上是区域经济、教育等发展失衡的反映，需要统筹推进数字资源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协同作用，避免形成新的失衡。

其二，效率视角。教育数字化发展指向三大目标：一是解决公共性教育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教育者差异性需求。三是降低数字化过程的成本，提高数字化发展质量。它意味着要统筹谋划，在投入成本、收益与质量间形成均衡。

其三，创新视角。教育数字化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产物。它带来教育场景的虚实结合及不同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与互联互通。因而需要教育发展的观念与组织变革，统筹构建一体化服务平台和数字生态，促进教育与治理体系重塑。

数字时代，教育创新发展既要积极接纳新技术，也要遵循教育规律，统筹考虑其应用标准，引导其健康发展，更好适应人与教育发展需要。

引自 2022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大学校长论坛报告 11 月 27 日

VUCA 世界与高等教育（讲话稿）

林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林杉（Ling San）

大家好！首先我想感谢主办方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为帮助毕业生应对未来所采取的措施。VUCA（volatile 不稳定、uncertain 不确定、complex 复杂、ambiguous 模糊）这个术语已流行了 30 年，具体是指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不确定、复杂而且难以琢磨。在上一个世纪结束之际，我们意识到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我们必须努力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全球性挑战具有跨国界和跨行业的性质，其解决方案也具有跨机构和跨学科的性质。

从大约十年前开始，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 打印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到一起，这导致科技工业和商业的运营方式，以及生活和娱乐方式迅速改变。2019 年底，新冠疫情袭击全球，超过 500 万人因此丧生，超过 2.5 亿人的健康受到影响。世界经济遭遇重创，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这些事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也因为这些事件，我们获得了很多好处。疫苗的研制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取得进展，新技术的出现减轻了疫情的影响，人类和整个社会开始寻找其他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有句古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无论是全球性挑战、工业 4.0，还是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疫情，为了实现有效应对，我们都需要彼此协调和融合。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必须灵活而迅速，解决方案必须具有弹性和可持续性。南大已经意识到即将出现的变化，在十年前，我们已经开始重构和重塑大学教育体系的历程。由于看到了利用技术提高教学质量的巨大潜力，我们决定通过平板电脑教学代替现场进行教学。通过网络，学生将到教室进行团队导向型和问题导向型学习。我们还将各种形式的技术增强学习（TEL）广泛应用到各种课程之中，在南大学习黑板平台的支持下，教学效率得到了提高，学生更早地接触到了 TEL，为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做好了准备。这也帮助南大在疫情到来时，短时间内实现了大约 1000 门课程与在线教学的无缝衔接。

另一项举措是始于 2015 年的结果导向型教学，南大现在所有课程都在采用这种模式，每一门课程甚至每个科目的设计都以预期目标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这有助于我们定义期望的学习成果，从而确定适当的评估形式和学习活动，实现预期目标。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新的本科学位课程方面进行创新，这是为了让毕业生拥有更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例如，我们的旗舰课程将工程和技术管理有机结合，其目的是培养具有创业精神的工程学领袖。去年我们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允许所有本科生使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来完成 10% 的学习内容，这一举措反响热烈。除了让学生接触更广泛的课程，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爱好和能力水平，从而对自己所面临的选择作出批判性的评估之外，还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想要成为终身学习者，这些技能必不可少。想要在未来社会中实现个人发展，就有必要掌握更广泛的能力，这指的绝不仅仅是良好的学业成绩。因此，我们扩大了招生范围，同时以更广泛的资质标准来评估申请人，这使得我们所拥有的学生群体是由比较广泛的人才组成的，实际上相当于有个更丰富多元的环境，帮助学生实现更全面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品格、有能力、具有认知灵活性，能在不断发展的 VUCA 环境中游刃有余的领军人才。这些可掌控未来且致力于终身学习的毕业生，将通过体验式学习和沉浸式研究获得更多的机会，学习科学将为他们提供大力支持。

第三项举措是体验式和协作式的学习，旨在增加学生在现实环境中的学习机会。从 2021 年开始，包括哲学和生物专业在内的所有本科生都必须进行实习，那些有志于创业的学生也将有机会向企业家学习，通过更多渠道接受他们的指导，在新冠疫情之前大约三分之二的南大本科生在毕业时可获得大量海外交流的机会，我们希望重新开放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学生受益。为了实现目标，我们新建了一个卓越教育创新研究中心，旨在推进教学工作，为教师提供动力，同时激励学生。与此同时，VUCA 世界瞬息万变，想要走在教育前沿的高等学府也面临着快速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无论是身体还是情感方面的健康问题。南大成立了一个大学福祉办公室，以便为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支持和帮助。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想要在 VUCA 世界中蓬勃发展，在保持与时俱进的同时，终身学习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五年里，南大通过为校友和在职人士提供线上、线下和混合型课程，在继续教育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包括创业与创新、其他跨学科的课程证书认证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我们的校友可以用学分支付在母校参加继续教育课程的费用。为确保这些课程与市场的需求密切相关，我们与行业合作伙伴和专业机构进行合作，共同策划和提供这些课程。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南大采取的关键举措，这将帮助于我们的毕业生更好地应对未来，并且成为终身学习者。今后，我们将继续创新并学习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实践案例，从而保障一流的教学质量。

引自 2022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大学校长论坛报告 11 月 27 日

全球慕课(MOOC)发展趋势研究(讲话稿)

陈肖纯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主席、郑州西亚斯学院理事长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分享对未来教育趋势的研究和分析。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慕课的话题。疫情前慕课不被看好，疫情推动慕课发生强力反弹，从而改变了教育模式、人才培养路径以及终身教育方式，这都是慕课的发展趋势给社会和教育带来的变化。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慕课的发展历史。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MIT)提出开放课件的概念，这是教育资源开放运动的开始。2008年慕课概念诞生，很多线上教育公司也相继产生。《纽约时报》称2012年为慕课之年。慕课最初的目的是要颠覆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也就是颠覆性的改革。慕课发展初期一直非常困难，课程完成率不到5%，普及性也不好。2019年前，80%的学习者都来自于发达国家，都受过高等教育。慕课似乎无法避免早先远程教育的发展命运，也就是说，大家不看好慕课。如果没有疫情，慕课是否会被淘汰出局，是否会消失呢？我们用一些数据来看看后疫情时代的慕课怎样在疫情之后得到拐点。

2020年新注册的用户占总用户的三分之一，单月注册数量大于2019年注册总数，慕课检索平台单日的访问量超过了同期整月的访问量，全球首次慕课的主题大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称2020年是慕课真正的诞生之年，所以慕课并没有死，而是得到了重生。慕课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数据显示，950所大学合作提供慕课的数量从2012年250个增加到2021年1.94万个，2021年增加的项目达到了3100个，慕课不仅没有死，而且增长速度惊人。它的用户增长速度也从2012年200万达到2021年的2.2亿。

疫情后，大学发现线上教育是唯一可靠的教育方式，所以大学开始与慕课公司结合，大学作为内容提供方获得收入6%-15%的分成，这非常可观。大学通过慕课公司向学习者投放广告，可大大降低成本，慕课公司也通过大学，开始搭建自己的营销和管理平台。这使慕课公司发现无需颠覆大学，也可以拓展自己的市场。因此，在慕课发展变革当中，在其企业和职业领域学习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于职场，学生只占20%，全职工作者占62%。

不单是大学，企业也发现终身学习的市场巨大，开始与慕课公司和大学互相竞争，比如，苹果公司在2017年和大学合作创办了慕课平台，还有很多知名公司都在企业和员工培训的方面纷纷出台产品来参与竞争。慕课公司大部分的客户都来自于企业客服和职场学习者，数量超过了大学本科生和高中生的总和，因为培训成本低、效率高，所以很多职场企业和慕课都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开发相应的课程，成为知识生产车间。在当今社会，不仅是大学，企业和慕课公司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未来的学习知识。

企业以前主要是从大学里面招聘人才，当他们发现经过慕课公司培训的人才更优秀之后，慕课公司也成为了招聘人才更好的渠道，有超过400家以上的大企业聘请慕课课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来担当他们的后备人员，也就是通过慕课平台来物色优秀的员工。同时，慕课推动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培养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将基础性和通用性的课用慕课的方式授课，加以线上专业课程的实践和指导，以此打破校企壁垒，实现大学和企业的资源互补。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我认为企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为非正式学习、终身学习及学习型社会等领域提供了非常好的框架体系。

目前，因为职场需要而选择慕课学习的群体，为慕课公司贡献了最多的收入来源。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的教育培训中占比最大的支出仍然是员工培训，同时微软、IBM都在通过慕课成为职业教育的主体。比如，IBM很早发起了教育项目，从不发达地区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与28个国家、20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由于教育和培训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开始涉足慕课业务，为推动构建终身学习的社会体系作出了贡献。

从传统意义来看,大学是培养人的生态体系,现在的慕课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到慕课在努力培养员工适应未来的能力,从而打造人员的生态闭环系统,这点做得很好。由于目前65%的学生未来从事工作的专业并不是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所以企业在提供教育学习内容方面就更加精准,成本又低,这也表明慕课公司与企业共同培养人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别是慕课公司与高新技术的合作,将为我们打造终身学习者的学习体系提供助力。

总的来说,将来无论大学还是企业,在培训方面都能得到很多机会。作为大学,应该看到这个市场的潜力,丢掉固有思维,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一定要通过慕课,通过这个市场争取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建设好全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

引自:2022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大学校长论坛报告 11 月 27 日

【教学研究】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姜涛¹ 孙玉娟²

1.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东北农业大学

摘要:课程思政是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孤岛”现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准确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精准把握当前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从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强化课程建设“主战场”、打造体制机制“全保障”入手,不断提升育人质量。

关键词 课程思政;问题;对策

基金项目 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复杂异质图结构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课题编号 22BXW052)的研究成果

引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 年第 20 期 p44-46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生素材向优质案例转化研究

赵富学^{1,2} 李林^{1,2} 丰涛^{1,2} 徐露^{1,2}

1. 武汉体育学院科学运动与健康促进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摘要:内生素材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素材类型,同时也是生成体育课程思政优质案例的重要支撑。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生素材朝向优质案例转化的问题、方式、机制和路径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认为:目前用于支持体育课程思政优质案例设计的素材,主要存在主题偏离、视野偏窄、存量偏少、层次偏低等问题。需要从体育课程与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组织、开展和参与的“学”“练”“赛”“研”等 4 个环节着手,梳理和总结体育课程思政的内生素材。按照目标设计专业化、结构设计系统化、方法设计多样化、评测设计精准化的向度开展,解析其形成过程。内生素材能够推动与体育课程思政优质案例的设计、扩充、组构、教学、核验等方面的要求有效结合,形成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内生素材向优质案例转化的高效路径。

关键词: 体育课程思政;体育教学素材;体育教学案例;体育教学;体育课程;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0FTYA001)

引自《体育学研究》网络首发 2022-10-14

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学模式重构与探索

彭鑫 余超 朱鹏 谢文武

湖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摘要:在后疫情时代,学校应将学生学习渠道由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向信息化、立体化拓展;

学生学业考核应从知识的获取与复现评价为主向学习成果产出转变；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应从线下的刚性督导体系向以信息化为基础，以目标达成度为核心的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转变；专业办学应建立服务于“四新”经济的开放灵活教育教学体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慕课；OBE；混合式教学；

基金资助：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17BXX004)；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8]436号、湘教通[2019]291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招标项目(HNKCSZ-2020-ZB018)；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0YBC372)；

引自《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2年第5期p24-27

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孙启鹏¹马姣姣¹王芳¹张晓赞²

1.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西安华为研究所

摘要：教学质量评价是高校教学的重点工作。在后疫情时代中，线上教学已成为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之一，针对目前高校线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线上教学模式的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不仅可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还可发挥激励作用，提升教师的教学成就。对疫情期间的大规模线上教学情境下收集的3377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线上教学配套设施建设及线上教学队伍培养是线上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线上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才能更好地推动线上教学工作高质量开展。

关键词：线上教学；教学质量评价；层次分析法；调查统计；后疫情时代；

基金资助：2021年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交通特色高校经管类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融通”的培养路径改革与实践(2021020029)；2022年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科学课题：立德树人框架下交通运输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TYB20-11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2020年面上项目：研究生个体创新能力培育路径研究(2020MSA415)；

引自《中国军转民》2022年第24期p56-57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法学教育的新文科发展之路

刘艳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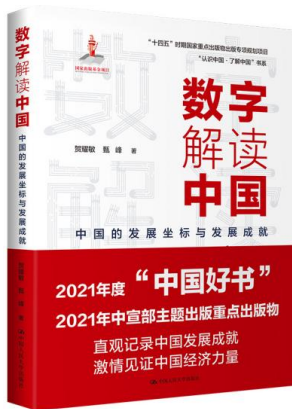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摘要：基于“理论法学+部门法学”学科体系所构建的传统法学教育模式过分强调专业细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割裂，使得培养出来的法治人才的思维方式相对狭隘、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实践能力较为薄弱，难以适应社会问题跨界化、知识应用综合化的时代需要，复合型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水平滞后于社会变革和法治实践。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发展理念渗透法学学科建设之中，突破法学知识固有的局限，推动法学教育跨学科化发展，有助于培养法科学子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新文科建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创新交叉融合机制，从法学学科内各部门法之间的“小交叉”向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大交叉”转型升级，从研究方法创新向学科设置创新转换，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等新兴领域培育交叉学科。

关键词：新文科；法学教育；学科交叉；交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基金资助：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兴法学交叉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2021060035)的研究成果；

【新书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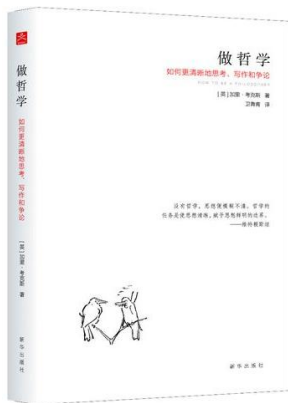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探索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本书作者从不同的维度，借助一系列数据对中国发展涉及的不同领域进行解读，内容涵盖人们关心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价、消费、投资、进出口、能源资源、金融、基础设施、社会福利、“一带一路”等，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更加直观、生动的中国经济图景。

目录：序：一、经济增长：GDP 的重要性；二、收入分配：你的收入提高了多少；三、物价：过高过低都不好；四、消费：赚钱为什么、五、投资：怎样才能让钱生钱；六、进出口：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七、能源资源：“柴米油盐”件；八、金融：一个“高大上”的行业；九、基础设施：每天都在用；十、社会福利：我们的

当下与未来；十一、“一带一路”：新起点、新机遇。

作者贺耀敏、甄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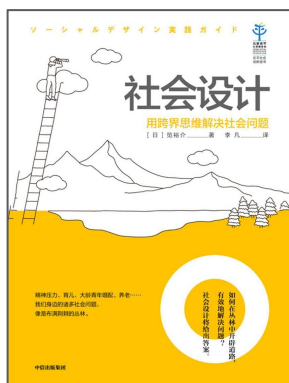


何谓哲学？如何做哲学，甚或成为一名哲学家？这个问题可能会吓到你。但是在作者看来，做哲学，就像做任何其他一件事情一样简单，你需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先从身边细小的事情进行哲学思维训练开始，培养了一定的哲学思维后再去思考那些宏大的哲学问题。做哲学，其实就像打网球一样简单。在书中，作者并没有构建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从怀疑论和存在主义这些我们熟知的哲学理论切入，通过《黑客帝国》《红矮星号》等我们熟知的影视作品，以及“一棵倒下的树”这个古老的哲学故事，来阐释不同的哲学理论，展示精彩的哲学辩论过程，引导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质疑、思考和辩论，培养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本书幽默风趣，妙趣横生，寓看似高深艰涩的哲学理论于日常熟知

习见的事物之中，论述透彻，深入浅出。读完本书你会发现 做哲学，原来也可以如此轻快活泼。

导言；第一章何为哲学：哲学与定义、定义“哲学”、哲学与冷硬的逻辑、哲学与言论自由、西方哲学之父、形而上学与更多柏拉图哲学、认识论与更多柏拉图哲学、关于正当行为的哲学；第二章怀疑一切：妥善进行哲学思考、幻觉与光学错觉、现象与现实、唯我论——外物存在吗、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笛卡尔与质疑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与上帝、笛卡尔之导向唯我论、驱散疑云；第三章一颗倒下的树引发的哲学思考：森林里的《恶搞之家》、问个愚蠢的问题、常识实在论、维也纳学派与不胡说的逻辑实证主义、大卫休莫与不胡说的逻辑实证主义、实证原则、声音对声音的感知、康德与先验观念论、萨特关于已区分的和未区分的存在的论述、非定论的结论；第四章如何用哲学来谋生；延伸阅读。

作者【英】加里考克斯著、卫青青译，新华出版社 2017 年版



《社会设计》以社会调查和田野观察方法为基础，详细地叙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步骤和具体方法，并列举了几种针对不同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实践方案，让读者快速掌握要领，为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做好准备。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精神健康、育儿、大龄青年婚配、养老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并快速蔓延，成为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纵横交错，给个人生活造成困扰并妨碍着社会协调发展。对此，这本书以“在丛林中辟道路”为比喻，以“社会设计”的方法来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路径。在社会调查和田野观察的基础，这本书

详细地叙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步骤和具体方法，并列举了几种针对不同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实践方案，让读者快速掌握要领，为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做好准备。

目录：引言社会问题和社会设计；第一部分?社会设计之旅；第1章丛林探访：把握社会问题的大局、走访现场、向先辈学习；第2章体察与倾听：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事人”、访谈“丛林居民”、访谈“丛林管理人”、访谈“丛林活动家”、记录、编辑、分享；第3章?绘制地图：社会设计旅程：社会主题地图、社会主题地图的种类、高质量的信息整理是绘制社会主题地图的基础；第4章选择立足点：立足点=你的项目主题、如何确定*立足点、小成功的大意义；第5章寻找同伴、“道普请”、共同创作的伙伴、提高项目社会影响力的伙伴、举办工作坊、为项目筹资；第6章构思路径：创意、头脑风暴、社会设计领域激发创意的三种方法、对创意进行整合和验证；第7章筑路：只管去做！——样品制作、体验式的样品制作、物品的样品制作、事业规划式的样品制作；第二部分社会设计实践案例：案例1 救灾志愿者技能标识贴、案例2 压力山大网、案例3 改良日本的育儿手账设计、案例4 社区导游手册、案例5?日本婚活大会、案例6?失智 艺术工作坊；终章 社会设计的基本元素：基本元素1：社会设计的原点是“人”、基本元素2：积极的态度、基本元素3：量和质、基本元素4：专业能力和*化能力、基本元素5：做减法的设计；后记；参考资料

作者【日】 觅裕介著、李凡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79 版